

人间

# 童年的雪夜

张凤英

北风悄然而至的时候,最先听见的是窗户纸。那糊得严实的窗棂,平日里沉默着,这时却微微地、颤颤地响,像有什么极轻的东西,在远远地叩着。我便会从被窝里探出头,竖起耳朵听——不是风声,是另一种更细碎、更密集的声音,沙沙的,簌簌的,由远及近,由疏到密,仿佛天地在絮絮地商量一件要紧的事。

母亲在灯下做着针线,头也不抬,只轻轻说一句:“落雪籽了。”我的心,便像被那细密的雪籽敲着,痒痒地、满满地漾开一层欢喜。

真等到大雪飘起来,总是在夜里。铅灰色的天幕沉沉地压着,雪片便从那无边的沉寂里,一片赶着一片,不慌不忙落下来。起初还能看见它们各自的身影,斜斜地、打着旋儿;不一会儿,便连成了片,织成了幔,茫茫地、软软地,将屋外的世界一笔一笔地涂改、覆盖。

屋里却是另一番天地了。炉火正旺,红红的火苗舔着黝黑的壶底,父亲的那把大茶壶,便发出“咕嘟咕嘟”安稳的哼唱。水汽蒸腾起来,混着烤南瓜籽微微焦糊的香气,还有大人们手中烟卷散出的、辛辣而又亲切的蓝雾,在低矮的屋顶下氤氲着,盘旋着,织成一张暖烘烘的、柔软的网络,将我们一家人妥妥地罩在里头。

大人们的声音在这网里也变得低沉、绵长。叔伯们来了,围着炉子坐下,话匣子便和茶壶一道开了。讲的都是些田里的事、旧年的事,声音平和,像窗外的雪一样,不紧不慢。父亲偶尔插几句,更多的时候是笑着听,手里的南瓜子嗑得脆响,“咔”的一声,是这冬日絮语里最干脆的逗点。母亲呢,总在炕沿边,就着那盏油灯黄晕的光,纳她的鞋底。针尖闪着极细的亮,穿过厚厚的千层底,发出“嗤——嗤——”的声音,又绵实,又安稳。那声音有一种奇妙的韵律,能将屋外风雪带来的、那一点点无端的慌张,全都抚平了。我便蜷在父亲身边,脚伸到靠近炉膛的地方,暖暖的。眼睛一会儿望着炉火出神,看那火焰如何变幻着形状;一会儿又支棱起耳朵,捕捉大人们话里那些似懂非懂的、关于远方的模糊影子。这炉边的辰光,是被拉长了的,是被烤暖了的,是沉甸甸的踏实。风雪在门墙之外,成了这安

稳最好的背景与陪衬。

最妙的,是白日的雪后。推开门,一股清冽的、带着甜味的寒气猛地扑进来,让人精神一振。世界全然变了模样,平日里熟悉的篱笆、柴垛、光秃秃的树枝,都胖了一圈,毛茸茸的,憨态可掬。阳光出来了,照在无瑕的雪地上,反射出亿万颗细碎的金刚钻似的光芒,晃得人眯起眼。街上少有行人,寂静得很,仿佛万物都在这厚重的白被子下酣眠。这寂静里,却偏有我们这群孩子,像忽然从地底冒出的、不安分的小兽,欢呼着,啸叫着,撞破这一片宁谧。

堆雪人自然是最正经的事,小手冻得通红也不管,拼命地将雪拢到一起,拍实。雪人的身子要滚得圆,头要滚得圆,这可是门面。鼻子嘛,最好是用母亲腌菜剩下的一截胡萝卜,红彤彤的,神气极了。眼睛最难找,得是乌黑油亮的炭块,嵌进去,雪人便一下子有了神采,憨憨地、定定地望着你。嘴呢,有时用弯弯的红薯皮,有时就用石子排成一排,像是在咯咯地笑。最后,不知谁从家里偷出一顶破旧的草帽,歪歪地给它扣上。一个活脱脱的、胖乎乎的伙伴,便站在了院子中央。打雪仗是更放肆的,雪团飞来掷去,在棉袄上“噗”地散开,脖领里偶尔钻进一点凉意,激得人一哆嗦,旋即爆发出更响亮更无邪的笑闹。玩到兴头上,帽子也丢了,浑身冒着热气,脸蛋红得像熟透的苹果。

闹得乏了,肚子也空了,便像一群归巢的雀儿,“呼啦”一下涌回屋里。炉火正温柔地等着我们。炉沿上,总有母亲煨着的几块红薯,表皮已经烤得皱起,渗出黏黏的、琥珀色的糖汁,香气霸道地往鼻子里钻。顾不得烫,两手颠来倒去地捧着,一边“嘶哈嘶哈”地吹气,一边迫不及待地撕开焦脆的皮。那金黄的心儿,滚烫,软糯,一股纯粹而丰足的甜,立刻从舌尖蔓延到四肢百骸,仿佛把一整个冷冽的冬天,都化在了这一口温热里。

而雪夜的晚饭,是这一日欢腾最圆满的收梢。天色暗下来,雪光映得窗纸发白。炉子上的铁锅“咕嘟咕嘟”地唱着更欢快的歌。那是

母亲炖的烩菜,白菜、豆腐、粉条,或许还有几片过年才舍得吃的、肥瘦相间的腊肉。香气不再是红薯那般单纯的甜香,而是浑厚的、复合的,带着油脂的丰腴与酱醋的醇厚,丝丝缕缕,勾魂摄魄。我们姊妹几个,早已围在桌边,眼巴巴地望着那口锅。父亲会将炖得烂熟的白菜夹到我们碗里,那吸饱了汤汁的豆腐,颤巍巍,烫乎乎,吃下去,一股暖流便从胃里直达指尖。屋外,是绵延无边的寒夜与静雪;屋内,是灯光晕黄,笑语喧闹,碗筷叮当。这顿饭,吃的不只是滋味,更是一份被风雪反衬得无比珍贵、紧密无间的团圆。

后来,我也读了些诗,知道古人将雪写得极美,极空灵。有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阔大,也有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清。可不知怎的,我总觉得隔了一层。倒是那首质朴甚至粗拙的“江上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”,每每念起,便让我会心一笑。那不就是我童年眼里最真切的雪么?还有那句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寥寥数字,那炉火欲燃、温情暗生的期盼,竟与父亲当年与叔伯围炉闲话的光景,遥遥地重合了。原来,最美的不是雪,是雪中那份“闲”,是那份因风雪而得以暂停、得以相聚的人间烟火气。

如今,雪还是年年下。城市里的雪,却似乎少了些韵味。它落在柏油路上,很快被车轮碾成污浊的;它堆在绿化带里,也显得局促而孤单。人们举着手机,拍几张照片,发个朋友圈,感慨一句“好大的雪”,便又匆匆钻进空调房,或步入地铁,继续各自的奔忙。那场雪,成了生活的插曲,甚至是带来不便的麻烦,再难成为一幕可以让整个生活节奏都为之舒缓、停顿的主剧。

我于是越发怀念童年那一个个雪夜。然而,怀念的或许不只是雪本身的纯净与欢乐,而是那被一场大雪所赋予的、独一无二的时空。平常的日子忙着生长,忙着劳作,而大雪封门,便仿佛给岁月按下了一个温柔的“暂停键”。一切外务戛然而止,天地逼着你收回向外奔忙的心神,回归到最初、也是最温暖的巢穴。时间变得粘稠而绵长,足够让炉火慢慢燃烧,让茶水慢慢熬浓,让一句话慢慢说完,让一个笑容慢慢漾开,让孩子依偎着父母,静静地听一夜风雪吟哦。

## 海霞

姜惠泉

在一个夏日的傍晚,大雨滂沱,天色昏暗。一放学,我便光着膀子往家里跑。从山上流下的雨水漫过了半条街,水声隆隆、泛着白沫,飞快地向低洼处流淌。

我跑进窄窄的胡同,迎面看见两个人从我家出来,打着雨伞。只听卓姐对一个小女孩说:“看看你舅,光着膀子,像条黑泥鳅。”那女孩和我差不多大,梳着两条油亮的麻花辫,辫梢系着粉白的蝴蝶结,正仰着头,抿嘴笑。我一时没认出她是谁,只跟卓姐打了个招呼就回家了。进门后,妈妈告诉我,海霞回来了——就是卓姐的外甥女,刚才在门外碰到的那个小女孩。

海霞家在新疆乌鲁木齐,这是来她姥姥家。我家和她姥姥家不同姓,我妈和她姥姥关系很好,两家走得很近。在我们还没到上学年纪,大概五六岁的时候,她从新疆回来住过一段时间,我们整天玩过家家。依稀记得,我妈妈和她卓姨经常用拇指和食指圈成两个圆,假装是相机。那时候,别说很多人没见过相机,就是照张黑白相片也得跑到三十里外的县城,骑自行车都是件奢侈的事,大多要靠两条腿走路,她们就这么逗我们玩,举着圈好的“相机”假装给我们拍照。

她这次回姥姥家,我已经十岁,上三年级了。第二天上学,老师领着海霞来我们班插班读书。她是从大城市来的,比起我们这些生长在闭塞贫穷农村的孩子来说,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,都显得文明开放得多,活脱脱就像天上掉下个“林妹妹”。在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下,她主动要求和我坐在一起。同学们疑惑地看着我们,并开始窃窃私语。我当时很害羞,脸上火辣辣的。就这样,她成了我的“小跟班”。

我记不清她具体长什么样子了,印象中是辫子上扎着漂亮的蝴蝶结,有着明亮的额头和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小精灵。

每次轮到我只值日打扫卫生,她就拿着我的书包,在教室里等我,直到我扫完地才一起走。我害羞,总是走得很快,她就紧紧跟在后面,对我说:“慢着点,别摔倒。”那时候,许多高年级的老师和学生站在院子里看着我们,我听见老师们议论:“真奇怪,这小姑娘怎么总跟着姜惠泉?”

那时候,放学后我们不仅要写作业,还要去田野里挖猪菜。因为她只是来走亲戚,家里不用她干活,她就每天陪我去挖猪菜。蹲在田埂上时,辫子上的粉白蝴蝶结蹭着草叶,她一边帮我捡猪菜,一边叽叽喳喳地讲乌鲁木齐的高楼、跑在铁轨上的绿皮火车,讲她见过的会闪灯的照相机——这些新鲜事儿,伴着田埂上的虫鸣,钻进了我年少的心里。

有一天,刚下过雨,我和海霞在街边用泥沙堆坝拦水。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农村孩子常玩的游戏,用泥沙筑坝拦水,等雨水积深了,我们就兴奋地在里面踩来踩去,仿佛这是一片汪洋大海。最后要么被越来越大的水冲垮,要么自己扒开,积水便如“滔滔江河”奔涌而出。有时还会把水灌进别人家里,惹来大人的一顿呵斥。这时,村里一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女青年看到我们在她家门口玩,就笑着对我说道:“人家是大城市来的孩子,将来要给你当媳妇呢。”海霞听了,小脸涨得通红,攥着我的胳膊往后躲了躲,仰着下巴,脆生生地回怼:“我会让我爸开火车,把他接到乌鲁木齐去!”

记不清我们这样快乐的时光持续了多久,大概有两三个月吧。海霞跟她妈妈回乌鲁木齐了。我很失落,回家告诉了妈妈。

从此,我们再也没见过面,也没有任何联系。但这段美好的记忆,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,至今已过去四十八年。

记得我和爱人第一次见面时,我问她叫什么名字,她说叫“刘海霞”。我脱口而出:“我青梅竹马的‘媳妇’也叫刘海霞。”虽然是玩笑话,但我和叫“海霞”的人似乎真有缘分。

姐姐说海霞比我大一岁,眼睛大大的,她长大后应该更好看。我一直有个想法,想去乌鲁木齐看看这位童年的伙伴。